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值得主旋律题材拍摄借鉴的优秀影片《吾爱敦煌》

■文张应辉

生活,其目的是挖掘日常生活中本有的真善美,或者是创造生活中缺失的真善美的精神内核,而非假恶丑的内容展示和夸大。近期上映的表现“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的影片《吾爱敦煌》是一部值得静心去接受灵魂洗礼的一部电影佳作。

在电影题材上,要把一个英模人物搬上银幕,容易被套上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性认知。《吾爱敦煌》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樊锦诗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展示到位,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日常,各种普通人所要面对的一切,樊锦诗同样要面对,她鲜明的个性是通过漫长的生活累积形成的,是有性格发展的过程变化,从一个北大毕业的青春少女到大漠敦煌工作60年,历经了生活的沧桑变化。对于观众而言,樊先生伟大人格的形成有可信度。这是基于生活真实,而非导演选择性地横截面式仅展示其辉煌的一面,否则容易让人有刻意提高之感。

一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无论是英模人物还是其他,要注重在情节推进中刻画人物性格的变化,这样更易于观众的审美接受,所塑造的形象真实可信,是在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樊锦诗经历了就业、成家、为人母、职业升迁、亲人生老病死每个节点,每个生活阶段都无异于常人,但是观众从影片中假设若置身她的阶段,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樊先生那样,电影题材的表现恰恰提供了这种反思的可能,观众做不到,樊先生做到了,她的伟大人格顺理成章被观众接受,人物形象就立起来了,这样的艺术处理给拍摄主旋律题材以很好的借鉴。

《吾爱敦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的形式外观是纪录电影,没有很强的戏剧冲突,但是人物的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冲突,樊先生60年坚守大漠,研究和守护敦煌文化,这份工作在外人看来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在莫高窟的时间仿佛凝固了,空间也禁锢了一样,与社会发展似乎脱节了。要有什么样的毅力才能坚守这样的人生?樊锦诗先生作为常人的生存与这样的工作环境之间产生了反差张力,吸引着观众去接近樊先生的伟大灵魂,从她对事业的执着中,从日复一日的平淡工作中,从与旅游开发者的顶撞中,从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中,一种生活平乏与事业伟大之间的反差让观众窥探到了樊先生的人格魅力。电影用自述的形式外观来叙事,让观众感觉亲近,容易产生代入感,进而产生共情。影片叙述语言的(内心独白)文学性很强,像一篇内涵深刻的优美的随笔散文,娓娓道来的叙述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音乐的旋律渲染,大提琴曲的垫乐与大漠苍茫的景象相应和,也只有这样深刻的大情怀配乐加上敦煌的大全景,才能映衬樊先生的崇高精神,作为大写的“人”的樊先生,她的精神境界笼罩着观众的审美感受,影片带动的审美情绪波澜壮阔,敦煌自然景观的大美与樊先生精神的大爱相辅相成,互相激荡,影片从而给观众产生崇高、壮美的审美感受。

《吾爱敦煌》让我们又重拾理想,反思自己的人生,观众在樊锦诗先生高尚的灵魄面前接受了一番洗礼,洗涤庸碌的人生俗气,寻求坚守理想信念,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追寻平凡

生活中的意义。所有这些正能量的感悟都能从影片中汲取到,这种感悟是悄无声息地沁入我们的审美感受,而不是生硬地说教,观众沉浸在樊先生高尚的精神世界里,看似平淡无奇的纪录电影拍摄,其带来的精神冲击力很强烈,这种表现手法是值得拍摄主旋律题材影片借鉴的。

《无价之宝》：不知所起的“一往情深”

■文/虞晓

《无价之宝》改编自韩国电影《担保》,讲述了一段“大叔与萝莉”之间超越血缘的伦理亲情故事:下岗工人石振邦(张译饰)和杨武(潘斌龙)开了一家五金店谋生,为了讨回欠债,两人临时照看欠债人的女儿芊芊,没想到的是,作为债务“担保”的芊芊却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无价之宝”。

身兼《无价之宝》导演和编剧(联名)的张大鹏,此前是资深的广告导演。2019年他联合执导的《小猪佩奇过大年》在春节档期表现欠佳(豆瓣3.8分、票房1.25亿),反倒是宣传短片《啥是佩奇》在网上火爆出圈,口碑和热度远超这部“水土不服”的真人动画电影。某种意义上,《无价之宝》可以视为张大鹏掌控了叙事权,由广告跨界电影的银幕“处女作”,广告经验和类型叙事的融合与冲突,也为辨析影片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维度。

传神的时代质感

故事发生在1995年的东北小城,是当下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影视作品中不停回望的岁月,是在下岗失业大潮和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东北的企业职工正经受转型期阵痛的年代。张大鹏说“人们都有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时间距离很近,但是从内到外,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还原年代感是拍摄中的“最难点”。除开服、化、道的逼真还原和影像的技术处理以达到追求的效果之外,影片更用“精练”的艺术手法,勾勒出那个时代的人。

清晰简练正是广告创意基本的准则,它要求抓住对象最主要的因素,从思想和形式上加以提炼。如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倡导的,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对这个人物已经形成的固有印象。

然而,故事片不等同于新闻报道和纪录片。新闻报道和纪录片的记录和宣教功能大于艺术功能。故事片作为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则正好相反,有着完全不同的前者的艺术创作规律,需要在两个小时左右的篇幅里完成戏剧冲突的起承转合。照搬新闻报道和纪录片看似安全省事,实际上很容易拍成平庸主旋律电影里常见的高大全式英模人物片,很难具有优秀故事片应有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正因如此,《我本是高山》主创从海量的张桂梅事迹素材中,结合影片创作过程中的采访素材,截取了华坪女高首届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的三年时间,作为影片故事的时间线,围绕这三年里张桂梅与师生一起筚路蓝缕、克服重重困难,冲破重重阻碍的经历展开叙事,着重描写了她和山英、山月、唐小萍、玖朵云等学生之间的感人故事,以及卢南山、徐影影、付春盈等年轻教师的群像,还有他们与张桂梅的戏剧冲突和师生情谊。

影片前半段,海清饰演的张桂梅强迫全体女学生剪短发,对学生严格得近乎粗暴。对老师则严苛得不近人情,霸道要求“周六周日老师就不放假了,寒假就休息五天”,刘雅瑟饰演的年轻女教师付春盈怀孕了,她不赞成,后来付春盈孩子生病要请假,她又很不高兴。这是张桂梅平凡和不完美的一面。

但随着故事的进展,观众逐渐发现张桂梅严厉背后对学生无私的爱和对老师的愧疚:强迫学生剪短

发是为了她们更集中精力学习;“体罚”那名女生是为了晒出钻入她身体的蚂蝗;自己生病刚收到捐款,就拿钱去给学生买了助听器;付春盈上课没空照看孩子,她默默帮着照顾,结尾对方告别,她流露真情表示愧疚,说“为了这些小孩子,对不起你们这些大孩子”。

正如皮尔斯所说,若符号与其指代对象间存在人为添加的属性,则符号成为象征符号。《无价之宝》中反复出现的道具也承载着象征的功能,成为了人物内心情感或社会群体思想意识形态的隐晦的言说。比如芊芊的游戏机,石振邦破门讨债时夺过它,送别芊芊时小心在书包里装上它,去“二叔”家解决芊芊时专门带走它,游戏机象征着孩子童年的欢乐和安慰。石振邦的小刀也类似,讨债时带上它以壮声势,被王曼丽顺手拿来切了苹果;它又被送给即将出国的王曼丽;她自杀后他在包里发现了这把小刀。这对男女心中隐秘的情感,不曾说出口的一部分已经“死亡”,比如王曼丽“母亲”的属性、“二叔”内心的廉耻和王宝身上的尊严,所以多年以后她(他)们的自杀、意外身亡或者是残疾,其实是果报叙事对“1995年”的陪葬。

广告的另一条原则是要具有冲击力,要对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影响力。《无价之宝》全片基本采用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最为华彩的部分是致敬《雨中曲》的石振邦舞蹈段落,这段带有魔幻色彩的镜头并不违和,是对角色的心理写实和情感写真。

隐含的视觉冲击

这些设计感极强的镜头,让这个现实主义风格的故事有了一份浪漫的诗意,让多舛的命运有了一份苦中作乐的暖意。张大鹏视听语言的娴熟值得称道,但过于密集的设计多少显得有些刻意,这是广告思维对电影叙事的干扰。

漂浮的类型叙事

应该说《无价之宝》是有佳句而无佳章,有一往情深,也有着不知所起的迷茫。张大鹏已经证明了掌控影像的才华,但个人表达和类型规范如何均衡,短片经验和长片叙事如何交融,这是作为电影导演仍然需要直面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问世,让少女有了一个专用称谓——萝莉。自库布里克以降,从《这个杀手不太冷》《孤胆特工》《怒火救援》到《宝贝计划》《人生

大事》,“大叔与萝莉”的故事就在银幕上不断上演,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叙事模式,无论面对枪林弹雨还是身处情感危机,这些故事总是在成人孩童、强大与弱小、世故与天真

的对立、反差和结合中,传递着温暖和治愈的力量。

按照《教猫咪》中对叙事类型的划分,《无价之宝》属于“伙伴之情”型的影片。这种类型故事讲述主人公的生活会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它们有着共同的母题:两个个体的生活因缺少对方而不完整。这类故事需要设置一个“不完整”的主人公,他在生理、精神或者道德方面有所欠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才能变得完整。最重要的叙事逻辑在于讲清楚变化,两个人情感关系如何一步步改变,从而对主人公产生影响发生变化。主角的成长是在“他者”意识不断觉醒而最终实现对“自我”这一主体身份的认同与确认。

《无价之宝》叙事上的问题就在于偏重状态展示,忽略了叙事逻辑。石振邦和芊芊之间的父女情似乎是一步到位,中间没有发展和波折;他对王曼丽的爱情更是来得相当突兀,缺少应有的铺垫和推进;他与杨武的兄弟之情在影片中是一个不增不减的恒量,导致男二号的角色戏剧功能极其孱弱。在这个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的故事里,人物少有成长变化,情节缺乏延展和递进,犹如一组不同时空的短片合集,单独看成色不错,却无法有机的整合成型。

《我本是高山》：凡人张桂梅的不平凡更励志感人

■文/胡建礼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对学生们的爱,否者她也不会在丈夫去世后一直坚持下来。崇高的信仰不会架空个人的情感。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支撑,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影片还有几处令笔者感动的地方。比如,高考前,老师带学生们爬上山坡眺望远方,老师对学生说“向XX方向XX公里是XX大学……”“翻过这些山,我们一起走出去”;山英的家人来学校要强行带她回去嫁人,全校学生齐声为她加油,那是山区女孩们对命运不公的呐喊;结尾,张桂梅和卢老师翻山越岭,连夜打着手电、隔着山谷大喊,告诉山谷那边的山英考上大学的喜讯那一幕,更是令人喜极而泣。

观者当然有权利批评一部影片不好,但前提是至少你要看过这部影片,围绕着剧本本身展开客观公允的评论。中国电影需要健康的舆论环境和专业的文艺批评,坚决反对对任何一部影片断章取义、乱扣帽子、生拉硬拽、蹭热点话题、上纲上线地批判。

《我本是高山》用电影故事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张桂梅,讲述了一群山区女孩子在张桂梅等老师孜孜不倦地教育下,由浑浑噩噩到奋发图强、逆天改命的故事,尽管受篇幅限制,对孩子们和学校的巨大进步略显铺垫不足,但不失为一部励志感人的主旋律电影佳作。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

这样的理解是断章取义和片面的。首先,影片对张桂梅的崇高信仰并非没有体现,而是巧妙地融入了她最喜欢唱《江姐》主题歌《红梅赞》的情节,融入了她带着教师做入党宣誓的场景,融入了她和学生齐声朗诵“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的段落,更是融入了她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原本要在梦中随丈夫西去,最终被学生们的医院楼下合唱《红梅赞》,她不赞成,后来付春盈孩子生病要请假,她又很不高兴。这是张桂梅平凡和不完美的一面。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观众逐渐发现张桂梅严厉背后对学生无私的爱和对老师的愧疚:强迫学生剪短